

徐宗澤編著

明清間耶穌會士

譯著提要

——耶穌會創立四百年紀念（一五四〇年——一九四〇年）

徐宗澤編著

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

——耶穌會創立四百年紀念（一五四〇年——一九四〇年）

中華書局

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

卷一 緒言

一 明末耶穌會士輸入之科學

明清之際，西洋科學輸入我國；我國學術界上頓呈一異彩焉。其輸入之介紹人，爲天主教之耶穌會士。其最著名者，爲利瑪竇、湯若望、南懷仁、艾儒略等。我國學者則有徐光啓、李之藻等。其輸入之科學，有天文、曆算、地輿、磁銃、水利及格物致知之學。此種學問，不特當時發生極大影響，即今日，亦保留其權威；其所以致此者，蓋當時儒士所談者，僅一種空疏之論，而於實用之學，盲然未知；今西士忽輸進利國利民之實學，士大夫之思想，能不爲之一新；而吾國人今誦其著述，亦能不油然而生景仰之心乎。今將西士譯著之書，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法，作一研究，以介紹於閱者。

二 西士所著書之分類

西士遺留於吾人之書籍，大綱可分爲宗教及科學兩類，其細目亦可分析言之：

宗教書中有論道理及講修成之書，有辯護、闢迷、釋難、解惑之書，有聖人行實，及聖教經文等書。科學書中，有天算、地輿、水學、哲理、小學、形下學等等。其著書之人雖盡為耶穌會士，而國籍則有意、比、德、法、葡、西、荷、奧、匈、波等國之不同；至論時期則自萬曆帝起，以迄乾隆中，達二世紀。著書之動機，則因各著作者所處時代之背景不同，故書中之思想，亦隨之而異；且每一時代與西士之遊者，階級不齊；有達官聞人出入於教士之門，有平民俗子亦親炙教士之言論；因而所著書籍，有義理奧衍，非翰曹不能領悟者；有詞句平凡，專為一般民衆閱覽者。而著書者之主觀觀念，亦因領悟中國情況有其不同之點，於是影響於其著述者矣。

三 羅明堅之天主聖教實錄

天主教教士欲入中國，宣傳聖教，實始於聖方濟各，惜未實行，齋志以沒。厥後實踐聖人之志者，實爲羅明堅、利瑪竇二人。一五八三年羅利二公得入吾國內地，在廣東肇慶，建立聖堂。是時，羅公洞明文字，爲宣揚聖教不可少之工具，即於一五八四年出版天主聖教實錄，是爲天主教教士到中國後之第一刊物。書中所論：天地有一生造萬物之主宰，掌管斯世；人神由天主所造，人之靈魂永不死滅，人死後，善則有永賞，惡則有永罰。天主定有十誡，命人遵守；人欲救靈須服事天主，而入其所立之教。

此等道理皆爲天主教之根本道理，給外教人以聖教初步之認識，宜乎此書一出，不一年而流布達一

千餘冊，外教人亦莫不承認聖教道理，吻合於人倫之大道，而表示歡迎。

四 利瑪竇之天學實義

繼聖教實錄出版之第二書，允爲利瑪竇之天學實義，後改名天主實義。天主實義者，利子與士大夫質疑問難討論教理而作也。此書較實錄爲優勝，所論皆哲理；達官顯宦讀之而皈依聖教者不乏其人，馮應京、徐光啓卽其顯著者也。

但天主教之道理，究爲教外人前所未聞，而國人當時之心理，抱閉關主義，嫉視外人，羅利二公深入內地，不無引起民衆之疑慮；故審時度勢，如直接以天主教之道理投入人心，人必畏而遠之，不若先以本性之學問，引人研究考問，而易於樂從，利子所以先注意西學之灌輸也。

利子在肇慶時，室中懸有地圖，人有來參觀詢問者，公爲之講解；堂中之耶穌及聖母像，亦吸引觀者好奇之心，公亦乘此良機，爲之講釋天主教之道理，聽者無不悅服。然此祇對於羣衆而言。至若爲文人學士，公則著書立說，以闡明教道；所言皆至理名言，文字亦華麗，故頗能博取學者之心；而其最有名之書，卽與徐光啓同譯之幾何原本，是書說理明通，條解詳悉，無一字之苟，一語之疏，宜乎梁啓超贊爲「字字精美，玉爲千古不朽之作。」（見梁著中國三百年學術史十三頁。）

五 西士所著書影響於中國整個學術

嘗考西士所著之書，在我國學術界上，其影響不限於局部，而為整個者也。何以言之，吾國學者自宋以迄明末，其所討論者為一般空疏之理學，不切實用，無補民生，其弊之所至，養成士大夫萎靡苟安之氣而已。梁啓超先生曰：「明朝以八股取士，一般士子，除了永樂皇帝欽定的性理大全外，幾乎一書不讀。學界本身，本來就像貧血症的人衰弱得可憐。」又曰：「利瑪竇、龐迪我、熊三拔、龍華民、鄧玉函、陽瑪諾、羅雅谷、艾儒略、湯若望等，自萬曆末年至天啓崇禎間，先後入中國，中國學者如徐文定、李涼庵，都和他們來往，對於各種學問有精深的研究……在這種新環境之下，學界空氣，當然變換。後此清朝一代學者，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，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，大概受利徐諸人的影響不小。」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三、十四頁。）可見吾國整個文化，受西士之感應力，實浩大焉。

竺可楨先生「近代科學先驅徐光啓」篇中亦曰：「當明之末造，士大夫無學術，而務欺詐貪鄙者淫者，相望於社會。上焉者如東林諸學子，亦斷斷於朱王門戶之爭，性之善惡之辨，雖顧憲成、高攀龍輩明是非，輕生死，明社之覆，黃梨洲謂『勇者燔妻子，弱者埋土室，忠義之盛度越前代，猶是東林之流風餘韻』，要非過譽。但萬曆天啓之際，外寇已深，內亂待發，兵不習戰，國庫空虛，而學者猶高談性理，出入禪道，其無補於時

艱也可知。卽負世重望，而爲公少年時素所拳拳服膺之焦澹園，亦致力於存心養性之學，謂「人之不能治世者，只爲此心未得其理，……若得於心矣，雖無意求治天下，而本立道生，理所必然。」且也佛學卽爲聖學，無怪乎公遇利子瑪竇而後知西學之足以進德，利用厚生，而爲之心折焉。」（申報月刊第三卷第三期）

準此而論：西士所講之學，所立之說，有起衰振敝之功，回生扶死之效，豈非因其所討論者，演其影響於國計民生，而爲我國整個文化上有其鉅大之貢獻乎？今試分別言之：

一 在地輿學 吾國古時對於地理學，絕少正確之觀念，西士製造輿圖，示地球上各國所佔之位置，古人錯誤之觀念因而改正不少。利瑪竇之萬國輿圖，南懷仁之坤輿全圖，白進等所測之皇輿全覽圖，以及乾坤體義（利瑪竇著），職方外紀（艾儒略著），坤輿圖說（南懷仁著）等書，允爲最著者也。柳詒徵曰：「元明間人，猶未究心於地理，至利瑪竇等來，而後知有五大洲，及地球居於天中之說。艾儒略著職方外紀繪圖立說，是爲吾國之有五洲萬國地誌之始，而清康熙中，各教士測繪全國輿圖，尤有功於吾國焉。」（柳著中國文化史下冊三〇六頁）旨哉斯言。

二 在天文學 明代曆法，沿用大統曆及回回曆，而欽天監所用儀器，亦多循元舊。明懷宗初，日蝕失驗，上罪臺監。徐光啓上疏言曆久必差，宜及時修正。上乃詔修曆法，敕公領其事。公荐西士湯若望、羅雅谷、鄧玉函等，設局修曆造器。清初南懷仁繼之，於曆法有顯著之貢獻，且引起吾國學者研究曆算之興趣。梁啓超

曰：「先是所行『大統曆』循元郭守敬『授時曆』之舊，錯誤很多。萬曆末年，朱世埏、邢雲路先後上疏，指出他的錯處，請重為釐正。天啓崇禎兩朝十幾年間，很拿這件事當一件大事辦。經歷次辯爭的結果，卒以徐文定、李涼庵領其事，而請利龐熊諸客卿，共同參預，卒完成改革之業……後此清朝一代學者，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，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，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少。」西士在吾國天文學之貢獻，可謂最有成績。」（梁著中國三百年學術史一五頁。）

三 在砲鏡 明末邊境不靖，始知西洋火器之重要，而講求鑄造。明史徐光啓傳謂：「徐光啓從利瑪竇學天文曆算火器盡其術。神宗時遼東方急，光啓力請多鑄西洋大砲，以資城守。」黃伯祿正教奉褒，「天啓二年，上依部議，敕羅如望、陽瑪諾、龍華民等，製造銃砲，以資戎行。」崇禎十二年，畢方濟上疏言西銃之效用，而頗受朝廷之信任。清初，亦迭命南懷仁製造大砲。是火器為當時朝野所重視，雖用之不得其人，而未著大效。然科學之利益實有不可淹滅者。錢江張星曜傳徐光啓曰：「公得西學守禦之道，精造火器，扞衛不虞，且更條陳保安制勝之策，屢疏於朝，上欲大用之，小人忌其功，沮抑不用，集有庖言等書，存於監局中，後章皇帝得之，讀不釋手，嘆曰：使明朝能盡用其言，則朕何以至此耶。」（見徐文定公三百年逝世紀念彙編。）

其他別種科學，如鄧玉函、王徵之奇器圖說，而重學典，熊三拔之泰西水法，徐光啓之農政全書，而水利農政有科學研究之說明，湯若望之遠鏡說，而西方光學輸入吾中國。總之諸凡科學，不必枝節枚舉，只要綜

要言之，已可知其梗概矣。

六 西士輸入科學方法之影響

夫明末清初西士所施於吾國學術界上之影響，不在某種學問，而在於治學之精神，即以科學之方法研究學問。故其所討論者，皆切實有用之學，裨益國計民生，而在明末之學界上，興起一反動之勢力，革新之興味。梁啓超曰：「明末有一場大公案，爲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，曰歐洲曆算學之輸入……要而言之：中國智識線和外國智識線相接觸，晉唐間的佛學爲第一次，明末的曆算學便爲第二次。在這種新環境之下，學界空氣，當然變換。後此清朝一代學者，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，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，大概受利徐諸人影響不少。當時治利徐一派之學者，尙有周子愚、瞿式穀、虞淳熙、樊良樞、汪應熊、李天經、楊廷筠、鄭洪猷、馮應京、方汝淳、周炳謨、王家植、瞿汝夔、曹于汴、鄭以偉、熊明遇、陳亮采、許胥臣、熊士旂等人，皆嘗爲著譯各書作序跋者，又蓮池法師，亦與利瑪竇往來，有書札見辨學遺牘中，可想見當時此派聲氣之廣。」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）又胡適之近在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講演，題爲「考證學方法的來歷」，謂中國近三百年來思想學問皆趨於精密細緻科學化，一般學者，認爲係受西洋天主教耶穌會教士來華之影響，其立論有二：一、中國大考據家祖師顧亭林之考證古音著作，有音學五書，閩若璩之考證古文尙書，有古文尙

書疏證，此種學問方法（考據方法）完全係受利瑪竇來華影響。二、考據學方法，係當時學者受西洋算學、天文學影響。」（見一九三四年一月大公報。）梁胡二氏之言，足證西士曾為吾國士大夫創治學之方法，而施其影響於吾國整個之文化。今試觀西士之著作，而信吾言之不誣焉。

有明一代承宋代之弊，專究明心見性之空談，而不務經世致用之實學，沿至明末，已奄奄一息，無復生氣矣。適此時利瑪竇來吾國，以西國治學之精神，求學之方法，研究吾國經籍，而發見吾國經典受宋代理學派之層層註疏，重重詮解，將經籍客觀本有之面目，以主觀之意見，改換其真相矣；利子於是主張直讀原文，不拘泥於程朱陸王等之疏解，庶古人立言之真旨，可以復明於後世。利子本此宗旨，研究古籍，事若無關大體，而其影響之所至，實給當時啓蒙之漢學派一大助力焉；清代之考證學、音韻學，尤為顯著者也。利子而後，接踵而來之西士，亦大都本利子治學之法，研究中國書籍，而當時吾國學者與散居全國之西士晉接者，亦莫不受其深刻之印像，而在彼等之著作中，不無蛛絲馬跡之可尋，如胡適之在輔仁大學演講「考證學方法的來歷」中有一段說，謂：「中國大考據家祖師顧亭林之考證古音著作，有音韻五書，閩若璩之考證古文尚書，著有古文尚書疏證，此種學問方法，全係受利瑪竇來華影響。」徐霞客之遊記，以親身跋涉山川，實地研究地理，宋長庚之天工開物，以科學方法詳說食物、被服、用器、冶金、制械、丹青、珠玉之原料工作，與西士地輿學，鄧玉函王徵之奇器圖說，徐光啓之農政全書，多少不無關係。至若梅定九、王寅旭等曆算學，都承明

末利徐之影響，自不待言矣。

七 西士所著之宗教書

西士所著之科學書，有其權威於吾國學術界，既如上述，今試言其關於宗教者。關於宗教之書亦已應有而盡有。西士之初入吾國也，欲尋索吾中國古書上。有何天地萬物主宰之觀念，乃遍閱經典，而知「天」與「上帝」二名詞，實物合於造物主之觀念，於是取用此二名以名拉丁文之 *Deus*，即天主，故利瑪竇初著之天主實義，本名天學實義，即此意也。

夫西士既入吾國，其所懷抱之志，乃在傳教救靈；書籍爲宣傳聖教之有效工具，而始初欲吾華人當知者即天主之爲何物，故羅明堅利瑪竇始初出版之書，乃天主聖教實錄及天主實義二書。但吾華人浸潤於佛教思想，迷信甚深，將古聖人對於真正之造物主信仰——天，上帝——等觀念，已淹滅不明，或持懷疑態度；西士於是著有許多闢邪崇正之書，如利瑪竇畸人十篇，徐光啓之闢妄，諛語偶編，破迷等等之書。佛老固爲迷信，但古代之真正儒家莫不信天敬天事天，天者造物主也。西士欲證儒教雖不與天主教背違，但非超性之真教，故有所不足，天主教者正可以補儒教之缺而完美之。西士於是取中國經書上之宗教思想，一一與天主教之道理，比觀而論，著有古今敬天鑒，天學本義，天儒印正，天儒同異考，補儒文告等書。教友既傾洗

入教，又當洞明教道；教道有要理，爲一教友不可不知之基本道理，有爲較深之道理，卽爲一教友之修養，當知之修成方法。爲要理，教士等著有十誡勸，論聖蹟，天主聖教問答，告解原義，聖教四規，天學略義等書。爲深造之道理，教士亦著有許多書籍，如修成神務，天階，七克，崇修精蘊，經世金書等等。

聖經爲教友當日常流覽之書，耶穌行實，聖人聖女傳，又爲教友當仿效之模範，西士於聖經聖傳，所以亦有不少之譯著。聖教傳入吾國後，不無風波之發生，而有教難矣。淺信德之教友，當波浪橫生，或在嚴刑之下，不無信德之搖動，間或有背教者；西士爲勗勉冷淡教友之熱心，或勸亡羊之歸棧，亦著有此類之書籍，如莫居凶惡勸，策念警喻等等。

西士傳教吾國，又高瞻遠矚，思先立一永久不拔之基。欲達到此目的，最要者乃成立一國籍神職班。爲此故也，於是超性學要，司鐸典禮，司鐸典要，聖事禮典，彌撒經典等書籍之出版，俾神職班得有其職務上應有之書籍；此種計劃，固非常可嘉者也。

八 西士與華士著譯書籍

綜上觀之：西士之著述，種類甚多，文字亦深淺不同；深者非常典雅，非翰曹不能讀，淺者通俗易曉，幾婦孺皆知。於是興起問題，此種書籍，是否由西士親自執筆著述，或西士口授，而華人筆之，或由西士起稿而華

人潤色之曰：此三種方法大抵皆用，不能執一而言之。羅明堅之天主聖教實錄實由羅子口授而筆之；（參閱 P. H. Bernard: Aux portes de la Chine, les Missionnaires du XVI siècle p. 229）徐光啓之幾何原本，利瑪竇亦講授，而徐子筆之。他若七克、泰西水法，亦未嘗不然。傅汎際、李之藻之實有詮，名理探、傅子譯義、李子達辭；讀名理探仁和李次彭之序而可知，其言曰：「先大夫（李之藻）自晤利先生於京師，嗣轍所之，必日借西賢切劘揚挖；迨癸亥廬居蠶竺，迺延體齋傅先生，譯實有詮，兩載削稿，再閱歲，因復繕是編（名理探）。蓋實有詮詳論四行天體諸義，皆有形聲可晰，其於中西文字，稍易融會，故特先之以暢其所欲言，而此則推論名理，迪人開通明悟，洞澈是非虛實，然後因性以達超性，凡人從事諸學諸藝，必梯是以為嚆矢，以啓其倪，斯命之曰名理探云。」第厥意義宏深，發抒匪易，或隻字未安，含毫幾腐，或片言少棘，證解移時，以故歷數年，所竟帙十許，乃先大夫旋以修曆致身矣。」又實有詮李之藻自序云：「……余自癸亥歸田，即從傅公汎際結廬湖上，形神並式，研論本始，每舉一義，輒幸得未曾有，心眼爲開，遂忘年力之邁，矢佐繙譯，誠不忍當吾世失之；而惟文言夏絕，喉轉棘生，屢因苦難闕筆，乃先就諸有形之類，摘取形大土水氣火所名五大者而創譯焉。……是編竣，而修士於中土文言會理者多，從此亦能漸暢其所欲言矣。於是乃取推論名理之書而嗣譯之。」

從此二序中，我儕可見當時譯書之一切困難情形，與夫用功之處，傅子則口授，李子筆之；口授者，猶慮

言不達意；筆之者亦恐文不切事。於是反復推敲，互助以補不足。此種堅忍工夫，豈現代學者所屑爲之哉。

試再讀幾何原本利瑪竇引曰：「……竇自入中國，見爲幾何之學者，其人與書，信自不乏，獨未睹有原本之論，卽闕根基，遂難窺造；……當此之時，遽有翻譯此書，質之當世賢人君子，用酬其嘉信旅人之意也，而才既菲薄，且東西文理又絕殊，字義相求，仍多闕略，了然於口，尙可勉強，肆筆爲文，便成艱澁矣。邇以來，屢逢志士左提右挈，而每患作輟，三進三止。歲庚子，竇因貢獻，僑邸燕喜，癸卯冬，則吳下徐太史先生來，太史既自精心，長於文筆，與旅人輩交遊頗久，私計得與對譯成書，不難於時以計偕；及至春薦南宮，選爲庶常，然方讀中祕書，時得晤言，多咨論天主教，以修身明事爲急，未遑此土苴之業也。客秋乃詢西庠舉業，余以格物實義應，及譚幾何家之說，余爲述此書之精，且陳翻譯之難，及向來中輟狀。先生曰：「……既遇此書，又遇子，不驕不吝，欲相指授，豈可畏勞玩日，當吾世而失之！嗚呼！吾避難，難自長；吾迎難，難自消微，必成之。先生就功，命余口傳，自以筆受焉。反覆展轉，求合本書之意，以中夏之文重復訂政，凡三易稿。……」

從利子之引言，不特翻譯之困難——「每患作輟三進三止」；「重復訂政，凡三易稿」——且譯才之難得——「屢逢志士，左提右挈，而每患作輟」；「余爲述此書之精，且陳翻譯之難，及向來中輟狀」，恍然可見。然利子於中國文字似已嫻熟，亦可概見。

利類思之超性學要，譯筆簡明，亦一部有數之書，今在自序中曰：「旅人九萬里東來，仰承先哲正傳，願偕同志，將此書偏譯華言，以告當世。自愧才智庸陋，下筆維難；兼之文以地殊，言以數限，反覆商求，加增新語，勉完第一支數十卷，然猶未敢必其盡當於原文也。」從此語可知利類思譯此書，必不專恃口授，且親自下筆，但文字雅麗，此則必借助文人之潤色。最後譯之天主降生論，文雖通順，而欠精邃，蓋修飾之功施之未多，而譯者文字之本相，反得以映照出也。

要而論之：西士所譯之書有口授者，有親筆而經他人修削者，有共事合作者；然無論如何，所譯之書必經西士寓目審考，而華士潤色之者也。

九 西士所編譯書之文理

至論文字有深淺雅俗之殊異，不特各人所著之書，有此殊異，即一人所著之書，亦且如此。何以故？蓋一由於西士對於中國文學，自然能由研究而增進，於是因刊著時期之不同，而有此殊異；二由於因助西士著作之學問有優劣，斯著述有高下之不同；三因所論之資料，有難易之殊，筆達之自然亦有難易之別；四因對象之不同，有爲文人學士而作者，有爲庸夫俗子而談者，於是文字有高深淺顯之分別，不可一律而論。西士所著書中，文字與雅潤譯者當無天主實義，畸人十篇，幾何原本，名理探等書，而其所以爲西人口者，亦坐此

故也。

十 華儒潤色西士之書籍

今再進論者：即同西士著譯，或爲之潤色者，是何等人物？答曰：第一流人物，當推徐光啓、李之藻、楊廷筠、中國聖教三柱石。其次則有馮應京、李天經、王徵、韓霖、段袞、瞿式耜等等，而教外官紳亦不少爲之修飾焉。梁啓超曰：當時治利徐一派之學者，尙有周子愚、瞿式穀、虞淳熙、樊良樞、汪應熊、李天經、楊廷筠、鄭洪猷、馮應京、方汝淳、周炳謨、王家植、瞿汝夔、曹于汴、鄭以偉、熊明遇、陳亮采、許胥臣、熊士旂等人，皆嘗爲著譯各書作序跋者。」（中國三百年學術史一四頁）從此可見凡作序跋者，必與西士有交誼，而於彼等之著述，不無推敲之關係者也。

雖然，往昔之西士於中國學問有其深切之認識，不特能讀古書古籍，且能信筆直書，曲達意義。蓋其心欲深究中國之文物制度，風化習尚，同而化之，以達到其榮主救靈之宗旨。有此懷抱，故不怕辛勞，埋頭伏案，必欲深通中國之典籍而後快。是以出而應世，與吾國士大夫交，即能折服人心，而令人欽仰。從此可知，學問者爲宣揚聖教之好工具，不特能聯絡情感，且能爲信光之先導，而感化人心；有歸化中國外教人之心者，當深思而熟慮之哉。

古昔之西士，深明此中關係，故與我國學者，對於譯著，通盤籌算，有大規模之計劃。金尼閣司鐸自歐洲回來，帶有西書七千卷，擬一一翻譯；李之藻擬編印公教叢書，而有天學初函之刊印；利類思有爲神職班應用之經典，神哲學等書，選擇要譯著；西士之熱心著述，已可見一斑。所惜時移勢變，而所定之目標，未能一一實現；兼之教難時興，致教士無安定度生之日；而十八世紀耶穌會之取締，會士不能繼續到我中國，承接文化事業，致始萌之科學，不得盡量生發，此則爲學術界上之一大打擊也。今西士遺傳於吾人之著述，散佚者亦不在少數，前哲心血所結善果，而後人不知保存，且漠不關心，此則可惜耳。余有感於此，爰將徐匯書樓所藏諸書作此簡單提要，以餉讀者。本年又逢耶穌會創立至今四百年，是書之刊印，亦爲紀念云爾。